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动制度科学性与管理有效性同步提升

——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

本报记者 谭怡 史冬柏

编者
的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围绕制度与管理深层次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落实到制度上

辽宁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李忠杰: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延非常广泛。它既是一种道路,也是一种事业;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理论;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历史进程;既是一面旗帜,也是一种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不同语境中提出和使用这些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将其主要归结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个方面。无论是道路、事业,还是实践、理论,最终固化下来,还是要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制

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党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党的建设上,还是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上,都越来越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落实到制度上,见诸一整套完善、严密的制度体系,才能最终固化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体制不断进行改革,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得到坚持,而且使各方面体制得到完善,进一步增强活力和生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

辽宁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

李忠杰:十九大报告逐一列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决定》进一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所有这些,依据其重要性,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即各方面体制等具体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这一套制度体系,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模式。它是一套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之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和时代实际结合起来、独特的制度体

系。这套制度体系,书本上找不到,外国找不到,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逐步积累的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不断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

我国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科科学制度安排

辽宁日报:在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性质和国家结构,我们的问题就围绕政治制度展开。请先谈谈您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认识。

李忠杰: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广义的政体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和国家的结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按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构成我国民主的基本框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

权利的政治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其他许多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建设民主政治可以有許多方面、许多渠道,但最根本的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它已经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辽宁日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基本政治制度的内涵和特色?

李忠杰: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

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其次,在“统一共和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是在多民族国家里解决国家整体与民族地方关系的一个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是国家的集中统一,核心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根本目的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最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层次较多,人民生活重心在基层,基层公共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基层民主同保证人民合法权益密切相关。因此,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从做到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推开,取得很大进步,对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努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辽宁日报:《决定》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什么这样提?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李忠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与治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是相对固化的,而治理是相对活化的;制度侧重于规范本身,而治理侧重于进行管理;制度侧重于文本载明的约束,而治理侧重

于人的主体性活动;制度一般是治理的基础,而治理可能会依赖制度进行,但也有可能不按制度办事而靠主观意志行事;制度的优势要转化为治理的效能,而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制度之上;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要由治理的成效来展示和检验,而治理的成效,可能与制度有关,也可能与人的主体性活动有关。

使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概念,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及其效果。制度好不好,检验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归根结底要看治理的效果。但同时,治理效果的好坏,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制度是否科学和完善。所以,一定要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同时,要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素质与能力。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2019东北振兴主题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史冬柏

12月16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辽宁省国资委、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主办的“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东北振兴的新篇章”2019东北振兴主题论坛在沈阳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国家级智库以及辽宁省委、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东北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共500余人参加论坛。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国务院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长李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人力资源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匡贤明,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刘伟奇,先后围绕“高举‘两个旗帜’,全面深化改革”“东北亚区域格局演变与东北开放新机遇”“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再探讨”“开放创新,振兴东北”“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战略构想”“以高水平开放形成东北振兴新动力”“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开放推动东

北发展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十四五’改革”“塑造以我国东北为枢纽的东北亚经济走廊新格局”等议题为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建言献策。

东北对外开放面临新格局。与会专家认为,要研究东北对外开放问题,首先要把握东北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在这方面要有大视野大格局。迟福林认为,未来5年到10年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有三个大的基本趋势:一是从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二是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三是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转向重要推动者。我国高水平开放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提供重大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韩、俄、蒙四国对我国的出口年均增长4.5%,是其整体出口增速的3.5倍,占其出口比重由15.1%上升至20.5%。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五国最大贸易伙伴,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近1/4。未来10年左右,随着我国内需潜力的不断释放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仅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提供重大机遇,也为东北地区向北开放提供最大条件。彭森认为,当前与东北密切相关的世界大势与国内形势主要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大变革,现行国际秩序和多边体系受到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动力减弱,经济增速放缓,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

旧发展模式转换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同时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地方经济分化明显,原因有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三是科技革命和数字革命飞速发展,对现有体制机制提出挑战。赵晋平认为,全球供应链调整已经开始,这在东北亚地区表现非常明显,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处在供应链调整的核心地位,这对东北地区来说是一次重要机遇。供应链调整要靠企业力量来推动,东北在制造业领域积累了一大批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同时在新经济领域也有一些崭露头角的独角兽企业,在推动供应链朝着有利于东北亚地区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去调整方面,面临重要机遇。

东北对外开放需要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指出:“下一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与会专家围绕东北对外开放新举措建言献策。常修泽指出,要着力推进“五流、一转变”。“五流”是指资金、技术、产品、产业、人员的流动,“一转变”是指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重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制度等。同时,与以往的内生性改革相比,现在需更多利用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涉及各方面、全方位制度的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深入人心。李凯认为,东北打

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做文章:向东,以丹东等为深化开放重点,沿鸭绿江等流域,打造贸易往来“珍珠链”,实现东北东部的新发展;向南,以服务贸易开放为重点,深化同日本、韩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大连可更好发挥作用,形成“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放的新态势;向西,以山海关为窗口,加强京津冀与东北协同发展,依托“一带一路”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深化同蒙、俄合作;向北,强化对俄开放合作,形成对俄开放新前沿。将对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以若干城市(地区)为重点,强化对东北周边国家的开放,强化服务业等新领域的开放,强化各个方向上开放高地的建设。张建平认为,东北对外开放应紧紧抓住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两大网络形成“双向联动”,加快创新发展。东北地区已有(辽、黑)两个自贸试验区,要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企关系,以及完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促进外资和国内公平竞争等方面下功夫。不仅要着眼于东北亚合作来推动东北振兴,还要着眼于全球化来谋划和部署全方位对外开放,可瞄准东南亚市场、非洲市场、美国市场、欧洲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重塑中国经济结构非常重要的依托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东北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市场份额,也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作为。

全民守法 共筑法治之基

邹立言

百家之言
SALINA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全民守法”,并着重指出:“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全民守法既是法治中国的基石,也是法治中国的最高境界,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科学立法树立权威,良法善治凝聚信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法治是规则之制,更是良法之治。全民守法的前提是科学立法,只有站在人民立场,反映人民诉求,维护人民根本权益,制定良法并施以善治,人民才会积极主动地尊法守法。科学立法确立起的权威性有助于法律成为信仰,进而促使人民自觉知法懂法、学法用法,追求法治,敬畏法律。

平等守法政府先行,自上而下层层推进。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民守法应自上而下,政府先行。只有各级政府宪法与法律范围内依法行政,并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先导层层推进,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尊法守法,推动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风尚。全民守法,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带头守法作出表率,身先士卒形成示范。领导干部必须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如此才能以“关键少数”带动“最大多数”。

公正司法守护防线,坚决捍卫法治尊严。要努力做到司法为公、司法为民,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群众眼中,法院法官代表法律,案件裁判结果就代表公平正义,因此对司法部门有更高要求和期待。要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共同守护好化解矛盾、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坚持培育法治文化,深入普法使守法成为自觉行动。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培育公民法治思维,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使守法逐步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引导公民凝聚法治共识,筑牢法治信仰,不断培育法治文化土壤,使每个人都在法治文化氛围中实现全面自由发展。运用互联网等多种方式进行普法宣传,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让尊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筑牢中国社会的法治之基。



新视界 SHIJI

用群众路线 破解“旁观者效应”

李仕权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改革过程中要破解“旁观者效应”的不利影响,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必须用好群众路线这个法宝。

“旁观者效应”是指:如果单一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某项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通常会作出积极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大大减弱,面对困难或遇到需要承担责任时往往会退缩。因为前者独立承担责任,后者期望别人多承担任务。比如,推进改革中,有的人冷眼旁观,认为改革是领导和上级的事,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有的人袖手“装睡”,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看见困难低头走;有的人口头拥护,却不愿意“改革从我做起”……“旁观者效应”的实质就是“多不负责,责任不落实”。

如何更好破解“旁观者效应”?唯有用好群众路线这个法宝。有一则关于毛泽东同志走群众路线的故事,至今仍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1941年,陕甘宁边区渭源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等。有关部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要作为反革命案从严肃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进行了阻止。当晚,毛泽东与伍兰花聊天拉家常了解到:伍兰花家有6口人,婆婆年老瘫痪,三个娃都还小,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收的公粮少,家里有余粮;但近几年公粮交得多了,还有干部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从群众的怨声骂声中发现了问题,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其他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这个故事深刻说明,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找准问题的症结,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要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就一定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破解“旁观者效应”的不利影响,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最大限度激发群众动力,最大限度减少发展阻力。